

中國三十年代

文學研究

李一氓



「左联」成立会址恢复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

“左联”成立会址恢复办公室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

“左联”成立会址恢复办公室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崇明红卫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375 插页3 字数135,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7—80515—331—0/I·34 定价:2.40元

左翼作家聯
盟遺址
中華藝術大
學遺址

左翼作家聯
盟遺址



快
後
左
後

遠
地
意
義

無
大
意
人

己未九月十日

恢復右喉遺

地，我積人成。

夏之桐

八七、八十七

为恢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大会地点 原中华艺术大学遗址开会

魏文伯



目 录

我们的目的与责任

- 写在“左联”会址恢复开放之际 张乐竺 (1)
有关“左联”战斗历程随想 沙 汀 (6)

- 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 汤逸中 (12)
“左联”成立大会史实寻踪 周国伟 史伯英 (29)
“左联”与日本左翼文坛一事 荣太之 (38)
“左联”东京分盟文献知见录 丛 荆 (51)
郑振铎与“左联” 陈福康 (75)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员续录 卢正言 (90)

真理与谬误的交错

- 对二、三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
传播的反思 邵伯周 (117)
- 鲁迅扶植文学报刊编辑的活动 沈永宝 (142)
“史题空托”话《豕蹄》 王尔龄 (153)
- 中国诗歌会研究述略 王训昭 (170)

三十年代上海几种文学期刊述略	潘颂德 (177)
柔石——简存高风	陈梦熊 (194)
于黑丁致卢正言信	于黑丁 (198)

我们的目的与责任

——写在“左联”会址恢复开放之际

张乐兰

在上海著名的四川北路长春路地段的多伦路(旧名 奕乐安路)一四五号处,有一座独园门庭的假三层楼房,初看并不起眼,但拂去岁月积下的尘埃,它宛如一块破石之璞,熠熠照耀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

现在,至于这座楼房建于何年何月乃至何人之手,已很难追溯和考证清楚。但有关的历史却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十年代时,《共产党宣言》中文本译者、原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曾在这座楼房里办起了“中华艺术大学”,明为艺术教育,实为我党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个外围据点,我党、我军的许多栋梁精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等,都是从这所大学开始踏上革命征途的。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由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决定在这儿召开,也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光阴流动,岁月荏苒,六十年虽是弹指一挥间,但沧桑却已数度变迁,这座楼房也就成为一家医院的托儿所了。然而,无论

是亲历此事的前辈，还是有志于革命文艺的后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将这个在国内外都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文物遗址修复并重新开放。

为恢复这个遗址，我局多年来在资料征集和宣传舆论上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一九八一年九月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市文管会及鲁迅纪念馆的支持下，我区组织了纪念活动，除举行《伤逝》电影招待会、区委有关领导发表“纪念鲁迅、宣传鲁迅、学习鲁迅”的讲话之外，我局还专门收集整理了以鲁迅为主的革命遗址资料编印成册，发至区级基层单位。有关鲁迅历史照片，还加了文字说明，在全区五条主要马路的宣传栏内宣传展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观看者络绎不绝，反应强烈。

一九八三年我局主动向区府提出收回“左联”遗址房屋，区委、区府领导都十分重视，亲自动手做了近二年的工作，一九八五年八月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我区郭祖禄区长和常务副区长蔡祖康会同分管城建的汪永安副区长及分管文教的彭淑妥副区长一起出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遗址的使用单位第四人民医院的党政领导也都出席了会议，并表示愿意动迁出去，坚决支持办成这件好事，会上就恢复遗址的有关问题勾划了蓝图，有关事项还作了分工。接着，九月份我局向市文化局打了恢复遗址专项经费的申请报告，以后又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与鲁迅纪念馆联名向在沪的“左联”成员夏征农、陈沂同志写了报告请求支持，得到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派了专人作了实地考察，都一致认为：恢复这个遗址非常必要，必须想方设法把这件事办好。但终因我局负责的经费问题难以筹集和落实而搁置了下来。

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月《文学报》就李白烈士故居开馆发表消息时，借题引用了我们关于恢复这个遗址的设想，即：“在文物遗址集中的长春街道内，逐个恢复价值较大意义较深的文物遗址，并与鲁迅故居及鲁迅活动的地点汇成一片网络，以供人们前往参观学习和瞻仰。”这一设想，立刻得到了上海萌芽杂志社主编曹阳同志的关切，他亲自来我局了解恢复工作中的困难，与我们一起向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及魏文伯、夏征农等老同志汇报请示，最后决定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贺敬之、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胡德华、全国作协副主席陈荒煤、张锲、书记处书记鲍昌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并广泛征求、听取了文化部前文物局局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轶青、文化部部长助理高运甲和文艺界、知识界人士叶圣陶、夏衍、阳翰笙、周海婴、潘德延等四十余位同志的意见，受到了原“中华艺术大学”校友、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的接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赞同这一举动，并支持以社会集资办法解决恢复“左联”遗址的经费问题。张爱萍同志还当即用铅笔草书了“左翼作家联盟遗址”、“中华艺术大学遗址”的名称，并于九月上旬用巨毫挥就这两个遗址的标牌，自北京寄给我们。尤其是一直关心这项工作的魏文伯同志（已故）还抱病以笔代口为恢复“左联”题字进行指导和宣传，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莫大的鼓舞，增强了我们对恢复遗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雅韵集评弹票友协会主席张宗儒先生及其夫人陈小洁贤伉俪为恢复遗址与我区虹口越剧团联合义演集资，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他俩还赞助了人民币壹万元作为恢复遗址的活动经费，为社会集资开了一个好

头。

一九八七年十月在鲁迅纪念馆与我局等十几个单位发起之下，组织的《纪念鲁迅在沪定居六十周年》活动中，我们请区委书记卢丽娟同志就恢复“左联”遗址向大会发出呼吁，立刻得到社会科学院的关切，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俊西同志专门派员来我局共商恢复遗址大事，并着手进行《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征稿及编辑出版工作。

我们的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心总是息息相通的。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市八届七次人代会期间，市人大代表卢丽娟（中共虹口区委书记）、鞠鸿麟（区人大常务副主任）提呈了《关于恢复“左联”遗址》一案，市府办公厅以市人大七次会议代表意见处理情况第二十号文件予以答复：“经市计委研究同意拨款伍拾万元”。

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同志率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亲临“左联”遗址进行实地察看，并与遗址所在地的中共虹口区委、区府领导共商恢复事宜。随后，市委和市府又批准由虹口区文化局、上海萌芽杂志社、鲁迅纪念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组成“左联”成立大会会址恢复办公室，着手制订恢复规划。“左联”会址能在“左联”诞辰六十周年前夕得以正式对社会开放，与党、政府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

虹口区人民政府城建、住宅部门筹建了近千余平方米的动迁房屋和场地，为会址的修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左联”会址的修复工程以及资料的征集与陈列所需的数拾万经费，大

部分来自社会各团体、工矿企业、文化单位的资助。如：四平开发公司、上海齿科材料厂等单位慷慨资助。其中，虹口区人民政府文化局隶属的影剧院等单位便资助了五十万元，其中群众影剧院一家就在李宁、孙敏建两经理的支持下，资助了十万元，表现了我区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革命觉悟和社会责任心。现居住在香港年已古稀的“左联”成员李辉英先生，还在我出差去港期间为修复“左联”会址捐献了他的著作和有关资料。现在，竖立在“左联”会址庭院中央的那块被鲜花簇拥的花岗石碑上，铭刻着所有有功于“左联”会址修复的单位、团体与个人姓名，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忘记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六十年前，革命先辈为了争取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白色恐怖下，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统一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的创作，用她自己的同志——李伟森、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等烈士的鲜血，写就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光辉篇章。六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继承、发扬无产阶级左翼文化的战斗传统，推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这便是我们恢复开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的目的，也是人民政府文化部门的责任。

有关“左联”战斗历程随想

沙 汀

自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两位同志向我提谈起有关三十年代“左联”成立经过、准备在上海市委指示下修复“左联”成立时会址、征集有关“左联”的文物资料以后，一直都不平静，不少往事经常浮现脑际。

余生也晚，参加“左联”又在“左联”成立以后的一九三二年，有关“左联”筹备和成立的经过，只有阳翰笙、夏衍两位前辈知之较深，其次就是周扬同志。尽管筹备、成立时期，他不曾参加，但从他接替姚蓬子主编《文学月报》、随又担任党团书记以后，一直持续到由于克服左倾关门主义，成立文艺家协会为止，他都是负责日常具体工作的主要人物。

阳、夏二公，尽管年近九旬，都很健旺。夏公记忆力特别强盛，他们都会提供不少第一手资料。而我最为挂念的却是周扬同志！因为年仅八十，可已在医院里躺了两三年了！显然短时期内尚难康复！而我最惦念的正是他。

这不止因为他目前不可能提供众多有关他任“左联”党团书记后所经历的艰苦复杂斗争的资料，还因为我之参加“左联”，是他的介绍，而且一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在创作上得到他不少帮助，相识也最早，建国后和他的来往同样

密切。更不必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一般说，近事容易出现脑际，举如他抱病的客观原因等等，但又往往伴随着巨大激动以俱来。最后，无可奈何，只有来个“想当年”了。约莫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我从白色恐怖笼罩的川西北到达上海不久，定居于东横浜路荣桂路德恩里时，我和周扬同志就通过肖崇素同志开始有了接触。

那时候他还叫周起应，同立波一道也住在德恩里，经常来找肖筹划出版《摩登月刊》。不久创刊号出版了，有他一篇美国果尔德的短篇小说，这可能是他第一篇翻译文章。

光景半年不到，他和立波就离开德恩里了。但在搬迁之前，因为我同杨伯凯、任白戈两位筹组辛垦书店，还曾邀请他提供了一本《果尔德短篇小说集》。尔后，作为书店第一批书同《依里奇的辩证法》等一道出版。

辛垦是同人书店，资金短缺。幸而他也从未过问版税，而且直到一九三二年底，先于我参加“左联”的艾芜才领我到北四川路的新居相见。其时我同任白戈已经退出辛垦。

这以前，在我的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付印时，艾芜曾介绍了其中两篇给《北斗》。《北斗》被封后，随即在《文学月报》发表了。他当时是《文学月报》的主编。同期还发表了一篇茅盾同志评介《法律外的航线》的文章，充分体现了当日左联在培育新生力量上的重要决策。

我是在“淞沪战争”爆发后离开德恩里的，在我和周扬同志重逢时，居住于虹口菜场附近。一九三三年，艾芜在曹家渡被捕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还送来鲁迅先生捐助的五十元，要我聘请律师为艾芜辩护。而在两个月前，《文学月报》还发表了艾芜的《伙伴》。艾芜从南洋来到上海以后，尽管就

已开始发表文章，而直到这篇作品发表却才引起文艺界较为普遍的注意。

从此，我和周扬同志的来往开始频繁起来，因为他很关心我被囚禁在苏州的艾芜，同时也很关心我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提高。

我记得，艾芜在史良同志辩护下出狱不久，他就以左联党团书记身份派我作左联常委会秘书。其时我已经由里虹桥搬到司高塔路口四达里住家了，距离鲁迅、茅盾两位前辈的住处都比较近。第一次会议，他们都参加了，此外就是周扬和刚刚穆木天结婚不久的负责组织工作的彭慧同志。

茅盾那天到得最早，在创作上给了我不少鼓励、指示，主要是鼓励我放开手写中篇，还在结构上为我提出建议。后来我之接受良友公司的组稿计划，准备完成的那个中篇，结构上就是按照他的指示写的，每章可以独立。可惜只写了《某镇纪事》，就因预支稿费问题搁下来了。

彭慧同鲁迅、周扬到后，会议就开始了。主要是讨论如何配合“世界反帝大同盟”组织的“满洲调查团”来中国进行调查，并举行“第二次世界反帝大会”所应采取的各种活动。

反帝同盟这两项活动，都是针对这之前，由国际联盟组织的“李顿调查团”偏袒日本，牺牲我国领土主权，以致激起我国人民反对和世界进步人士义愤而采取的具体措施。预定的领队是巴比塞。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一个问题，是否继续出版一九三一年被反动派查封的《前哨》那种半公开的刊物。因为有些文章不便在《文学月报》发表，继《前哨》出版的《文学导报》又在《北斗》创刊后停刊了。常委会虽未作出最后决定，会议前夕